

## 毛泽东阅读史略（一）

常言道，书山有路。毛泽东一生登攀书山之路，别具风景。

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情感愉悦和情感表达史。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阅读生涯和他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他的阅读史，也是他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

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个人的兴趣和精神状态不同，毛泽东重点阅读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总体上来看，各个时期的阅读，都或隐或显地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从这几个角度来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可以更切实而具体地了解他在不同时期为什么读书，重点读什么书，怎样读这些书，如何运用书本知识，这样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话题。

### 一、求学年代：阅读与寻找“本源”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当时其他农家孩子一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以及《论语》《诗经》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诗经》和《曾文正公家书》。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多是像他那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几年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里面讲，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这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真正把读书与立志联在了一起。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实际上，17岁的毛泽东并不清楚他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的决心，表达得很明白。

正是沿着读书求“本源”的思路，毛泽东在当时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然后“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个思路，他1917年9月23日和同学张昆弟等人谈得很彻底：“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毛泽东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这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为了寻找“本源”，毛泽东当时下工夫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典籍。

这类书籍，为当时毛泽东广泛阅读，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从毛泽东当时的通信和文稿来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輿纪要》等文史作品。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在修学储能和修身处世方面，特别是对他既张扬进取又勤苦务实的个性养成，有明显作用。

第二类，是介绍西方“新学”的著述。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西方新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初读新学著作，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1917年读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全书约10万字左右，竟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他还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

这些新学书籍，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思想启蒙作用，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作出求变求新的选择。毛泽东1950年重新看到自己早年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时，便对人说当时“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 二、五四运动前后：阅读与选择主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1921年1月初，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还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毛泽东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运动渐进高潮。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然间把他推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和教育界爱国运动，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四处奔走，倡导湖南自治，参加建党建团活动，创办自修大学培养进步青年等等。虽然公开和正式的职业一度是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但他事实上已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再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依然钟情书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时期结合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需要的阅读，使他的探索异常活跃，认识不断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1918年夏天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这对喜欢读书的毛泽东来说，就像是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可以放开肚皮啃吃新鲜的“知识青菜”。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一干进步青年也多有来往，这无疑是难得的幸运，也使他接触新思潮的起点大大提高了。

1920年夏天，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他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对这个书社，毛泽东从头到尾非常敬业。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请胡适、陈独秀这些名人给他担保，从各个出版公司选进图书，还列出推荐书目，撰写售书广告，招募读书会友，发布营业报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营书店或个体书商。在此期间，除领导新民学会活动外，毛泽东还先后发起成立和准备组织健学会、问题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等等，大力推荐和阅读各种新书。

毛泽东当时的阅读，已远远不是为“修学储能”，也不是为接近先前脑海中那个说不清楚的抽象的“大本大源”，而是同寻找现实的救国方案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便主张把原来“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改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的目的，已明确为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

“主义”为什么重要？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阶的信中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因此，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最紧迫的是“要变为主义的结合”。

“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理论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可以互换的表述。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是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极为迫切的阅读和思想探索主线。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会的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为倡导，“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才“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

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宗教上之主义；（五）文学上之主义；（六）美术上之主义”。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毛泽东再次主张：学会的共同行动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同时要求会员们在看书的基础上，定期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五六个主义”。

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这段时期注重阅读的书刊，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有：《柏拉图之理想国》《赫克尔一元哲学》《欧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西洋伦理学史》《欧洲文学史》《现代教育的趋势》等。

译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方面的论著有：《现代思潮批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讲演》《美国民治的发展》《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欧美各国改造问题》《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国际联盟讲评》《到自由之路》《工团主义》《实验主义》等。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有：《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试验论理学》《天文学》《科学通论》《达尔文物种原始》《创化论》《生物之世界》。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通过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的书，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后来提到有三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都是在1920年读到的。

毛泽东通过阅读寻找“主义”，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书斋里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选择“主义”是件大事，必须经过比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当时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抛弃。

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而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好的方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

关于读书与信仰的关系也很复杂。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他当时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实践，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1945年，蒋介石还读了中共七大制定的《党章》，对《党员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两节十分推崇，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蒋介石阅读的例子告

诉我们：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读书对他们的思想信念确实能起到作用，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关键在于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其有否实践书本内容的兴趣。

### 三、风云岁月：阅读与实行革命

投身革命以后，毛泽东的读书和实践需求，就密不可分。

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毛泽东1964年8月25日就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在“实行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到把革命书本运用到革命实践不易，光有实际经验没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因此，在“实行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读书视为根据实践需要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惜，毛泽东“另请购书”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在给李立三的信中又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当时，毛泽东读得最熟的两本书，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立即推荐给彭德怀读，并在信中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书后，他又推荐给彭德怀读，在信中说：读了这本书，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可见，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书籍，他的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读书理念，何其鲜明。

毛泽东本人从1931年秋天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中央领导层“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逐步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领导权。受排挤和打击的理由，除了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就是认为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客观地讲，毛泽东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那些教条主义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这是“左”倾错误统治能够在中央盛行达三年多时间的重要原因。

为了从理论上驳倒“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特别渴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指导，一旦得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样的书籍，便反复阅读。

不少人回忆，他在长征途中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

即使如此，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对毛泽东的打仗方法还是不买账，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照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来指挥战争，“并不高明”。言下之意，还是缺少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此事对毛泽东“刺激”不小，成为他到陕北后那样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

## 毛泽东阅读史略（二）

陈晋

### 四、初到陕北：阅读与总结经验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逐渐稳定起来，毛泽东的阅读条件随之改善，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和倡导读书。

1936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致电红军西方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比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同时提倡在外面工作的同志"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两批书，恰如雪中得炭。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毛泽东等人的，其中包括鲁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义》《世界知识》《论语》《大众生活》等；一批是在北平购买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李达《社会学大纲》等，均由王林送到陕北保安。毛泽东1956年春听取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林等人汇报工作时，还提到当年买书的事，并说书现在还有，实在感谢。1965年10月又讲：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可见那时渴盼书读，真个是如旱望云。

初到陕北那段时间，除马列原著外，毛泽东重点阅读的书籍有两类：哲学和军事。

(一)"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作了深入的采访。他记述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读到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这年8月给易礼容的信中说，"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并希望能够和李达建立通信联系。据郭化若回忆，在和李达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他们讲：李达寄来他的《社

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我已经读了十遍，还寄来一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1937年1月迁到延安后，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在发奋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比如，1937年9月读完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就写信给作者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空，我来看你。"随信附有用毛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内容，4500字左右。**批判性阅读！**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略有疑点"的一个问题，指《哲学与生活》中这段论述："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抄录这段话后，在后面加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地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

如此细微地辨析一个哲学概念，足见阅读之细、思考之深。毛泽东这段时期读的哲学书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批注内容主要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以及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下苦功研究哲学？主要是他确实感到自己的马列主义哲学水平不高。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毛泽东1937年5月至8月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每次备课，都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郭化若的一个回忆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当郭化若说没有赶上到"抗大"听毛泽东讲哲学课时，毛泽东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对此事，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还谈到："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

毛泽东当时发愤阅读哲学书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回击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对他的批判。教条主义曾给他戴了顶"狭隘经验论"帽子，甚至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能说毛泽东心里没有憋一口气。只有发愤读书，掌握理论工具，占领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制高点，才能澄清和回击此前对他的批判，才能从根本上驳倒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这个出发点，毛泽东从不隐晦。上面提到的郭化若的回忆中还记述，1937年8月看望毛泽东谈到读书之事，"主

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

## (二) "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是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读军事书籍，也复如此。他当时阅读军事书籍的急迫之情，可从下面几则电文来感受，从中也看出他研究军事所关注的重点所在。